

视域拓新与深耕细作

——近五年李大钊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琳玲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李大钊研究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领域的重要选题。近五年来,李大钊研究取得了突出成果,呈现出研究内容广泛全面、研究主题关切现实、研究维度多向拓展等显性特点。新的历史背景下,深化李大钊研究要以时代问题为起点、以学科融合为依托、以思想比较为路径、以历史细节为基础、以学术前沿为引领,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提升研究水平,从而为促进李大钊研究的综合创新与整体跃升注入不竭动力。

关键词:李大钊; 党史人物;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 B261; D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25)02-0001-11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25.02.001

Expanding Horizons and Deepening Research: A Review and Outlook of Li Dazhao Studie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ANG Linli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studi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Li Dazhao studies, characterized b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content, practical research themes, and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expansion.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deepening Li Dazhao studies should start with contemporary issues, rely 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follow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comparison, base on historical details, and be guided by academic frontiers, continuously expanding research horizons and improving research levels, thereby injecting inexhaustible momentum into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of Li Dazhao studies.

Key Words: Li Dazhao;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CPC; literature review

收稿日期: 2024-08-08

基金项目: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青年项目(2023QNXM08)

作者简介: 王琳玲(1998-),女,江苏盐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方面功绩卓著,并且在社会科学领域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一直是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领域研究的重要人物^①。近五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李大钊研究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成果丰硕。2020年出版的《李大钊年谱》(杨琥著)“集编、研、注于一体”^[1],多方面、多角度地记述了李大钊的生平事迹、思想主张、革命伟业,内容翔实、丰富,资料真实、珍贵,堪称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相关学术论文则更为丰富。据中国知网不完全统计,2020—2024年仅发表于核心期刊、以“李大钊”为主题的论文就有300余篇,对李大钊在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等领域的成就均有研究。此外,近五年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充分发挥阵地引领作用,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与学术年会并以此为依托编纂李大钊研究论文集;创立了《李大钊研究》学术内刊,支持科研立项,建立研究与教学基地,在阵地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推动李大钊研究的视域拓新与深耕细作集聚了人才力量、提供了组织支撑。2024年是李大钊先生诞辰135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本文拟对近五年来李大钊研究的整体进展与主要成果进行回顾,对该领域的阶段性研究热点、发展趋向与未来着力点进行分析梳理,期以一孔之见为推动李大钊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一、李大钊研究的热话题与新思考

新时代为李大钊研究提供了新土壤、铺设

了新根基。尤其近五年来,学界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将李大钊研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结合”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时代话题相结合,在追溯党的理论缘起的同时,推动了李大钊研究的学术创新,也形成了诸多热话题与新思考。

(一)对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的研究

一直以来,李大钊提出的“第三新文明”论都广受学界关注。近年来,伴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新理念的提出,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论亦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学界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的内涵进行深入挖掘。“第三新文明”论的核心指向是“俄罗斯之文明”^[2],即社会主义文明,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并不断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第三新文明”论中的民主意涵进行重新确认。如有学者提出,在李大钊看来,“庶民与大众”是“塑造新文明及其命运共同体的新主体”,故而,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成为“新文明”的应然指向^[3]。再如有学者关注到了“第三新文明”论对中国主体性的挖掘。他们认为李大钊的文明观“超越了‘体用之辩’”^[4],完成了对文明民族性的发展,其本身便包含了“对历史主体的再认识”^[5],并“揭示了中国新文明创造的主体担当”^[5]。值得注意的是,吴汉全与魏波等指出了李大钊文明思想的现代性指向,强调了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在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准确捕捉了马克思主义

^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掀起了数次李大钊研究热潮,主要成果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对李大钊文本著述的整理、汇编、校注与考辨等。如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的《李大钊文集》(1999年出版)及《李大钊全集》(分别于2006年和2013年出版),李继华的《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2011年出版),王宪明、胡庆祝的《李大钊思想文本研究》(2019年出版)。其二是通过编撰辞书及李大钊传记、年谱等对其生平、活动、思想发展等进行记述。代表性成果有李权兴的《李大钊研究辞典》(1994年出版),朱文通的《李大钊传》(2005年出版)、《李大钊年谱长编》(2009年出版)等。其三是对李大钊思想理论的专题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李权兴的《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1989年出版)、吴汉全的《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2002年出版)等。此外,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过程中,亦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李大钊的相关论题,为国内学界提供了有益参考。如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89年出版)、后藤延子的《李大钊思想研究》(1999年出版)、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2006年出版)等。

的现代性意涵,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方案”^[5],也“为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型提出了发展方向”^[6]。

其二是对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的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第三新文明”论是李大钊在民族国家视域下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结果。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此种文明论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先进分子探索国家出路的重要思想表达之一”^[7]。然而比之更进一步的是,有学者对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论的世界价值作出了新的定位,认为“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观所呈现出的主动求新精神和‘救世界之危机’的人类视野……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原点”^[8],突出强调了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中“世界”命题对“国家”命题的超越,并且认为此种文明观契合了彼时知识分子对“创造一个具有新文明形态的‘新世界’”^[3]的更高价值追求。

(二)对李大钊文化观的研究

李大钊文化观研究不是新选题,而是随着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关注而产生的新的生长点,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该选题的新思考和更为深入的新探索。近五年来,学界对李大钊文化观的生成逻辑与思想要素进行了再研究,新的研究成果更加关注其思想细节,进而对既有结论进行了深化和补充。如有学者考察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生成逻辑,指出李大钊文化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9]。亦有学者关注了李大钊文化观的儒学要素,对其“尊孔”与“反孔”倾向作出了评析,并就李大钊思想中的儒家精华作出细致爬梳,丰富了“对于李大钊本人如何内在地学习、践行孔子学说及儒家思想”等相关问题的探索^[10]。此外,有学者就其文化观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关联进行了讨论。如吴汉全等认为李大钊能够“将文化的改造与文明的发展作为思考的重点,以‘民族的自我’及‘自我的民族’的自觉心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表明他已认识到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传统文

化在结构的基础上而予以创造性转化,并进而依据时代特征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实现创新性发展”^[6],这显然是李大钊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问题上的重要探索。再如,有学者认为“李大钊立足中国实际和民族精神根基,以广阔的全球视野和辩证的时代思维,既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进行了深刻批判,又对中西文化价值内涵进行了理性的比较与客观评价”^[11],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思想与态度,“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发展,开创了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先例”^[10]。在此,相似观点与论述不再一一列举。可以说,目前学界已在一定程度上就李大钊文化观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达成了共识。

(三)对李大钊中华民族观的研究

近五年来,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抑或说中华民族观作为新的研究热点,在观念史梳理与政治学考察方面皆有新突破。

其一是对李大钊中华民族观念的溯源性挖掘。有学者指出:“李大钊第一个高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大旗,实开创了近代国人从更加完整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之先河。”^[12]另有学者从观念史的角度指出,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经历了由辛亥前后胡汉对立的“吾华”观念到“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再到基于民族解放意义上的“历史文化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的转变过程^[13],而此种转变事实上亦符合从“种族的中华民族观”到“‘新中华民族主义’中华民族观”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观”的演变过程^[14]。故而学者们认为,李大钊的民族观“超越了简单用文化和血统界定民族的传统”,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处理由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制定打下了基础^[13]。当然,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同样引发了诸多关注。如针对学界普遍认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内阐发“民族复兴”思想第一人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最早提出的可能是陈独秀”,而

彼时李大钊的“民族复活”主张尚与“民族复兴”的含义不尽相同^[15]。

其二是对李大钊中华民族观内涵的差异化解析。有学者考察了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意识,认为李大钊能够“以民族的观念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其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抽象意义的国家,而更着意于国家之中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大众”,这无疑彰显了其民族主义内含着深深的“苍生意识”^[16]。还有学者探讨了李大钊的民族自决思想,肯定了李大钊民族理论中“强调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一重要内容^[17]。另有学者剖析了李大钊民族思想的出场背景,并系统考察了其民族观念中赞美中华秀美江山和昭示文明、主张国家统一及民族团结、宣扬民族新机复活的光明前景等重要内容^[18]。

总之,现实语境与时代话题的发展与变迁为李大钊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围绕文明观、文化观、民族观等课题,学界结合历史与现实作出了诸多创新性的研究与尝试。除上述话题外,李大钊与伟大建党精神^①、李大钊的青春与青年思想^②等同样备受关注,在此不作过多赘述。

二、李大钊研究的学科拓展与多维视角

近五年来的李大钊研究弥补了早期对其“思想中多元与复杂的面向有所忽略”^[3]的不足,在多维视角下实现了学科拓展与深化。2020—2024年,诸多学者进一步尝试视角转化与多维创新,在史学、法学、图书馆学、新闻学等方面实现了新突破、取得了新成果。

① 代表性成果有:王宪明的《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3期;韦磊的《李大钊践行与担当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论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杨梓楠的《李大钊与伟大建党精神》,载《中国档案》2022年第4期;杜品的《建党初心与李大钊的先期理论建构》,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5期;李阎的《论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载《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年第16期。

② 代表性成果有:耿立春的《李大钊青春思想的当代价值》,载《当代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朱喆、王钰涵的《从李大钊到习近平:关于青年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年第20期;宇文利的《李大钊:塑造革命的雄健国民和青春力量》,载《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Z3期;冯留建、张志浩的《李大钊“青春中华”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载《毛泽东研究》2023年第4期。

(一)史学视域下的李大钊研究

李大钊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毋庸置疑,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性贡献早已被学界广泛认可,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19]、“亲自倡导历史学革命的先驱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20]。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一般将李大钊的史学贡献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系统传播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二是探索建立史学理论体系;三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在此基础上,近五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提出了建构新的历史学体系的很多有益构想,特别是他建构的史学体系“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核心、以王朝史为核心、以政治史为核心的体系,提出了从个人史到人类史为核心的新模式”^[21]。另有学者认为李大钊首次将中国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22]。

同时,对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内容考察仍然是重要话题。如有学者对李大钊的世界史思想进行了专题考察,认为李大钊正是通过分析唯物史观的“前史”——西方历史哲学,才确认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以及“它在诸多历史观中的核心地位”,进而肯定李大钊“开创了中国史学系统研究西方历史哲学之先河,更为中国世界史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3]。另有

学者对比了中国史学界对李大钊与郭沫若的认知与评价,通过考察学界对二者的不同定位,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不同分期,认为二者分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萌芽期和形成期的标志性人物。还有学者认为应辩证看待李大钊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象征意义与节点意义,全面而系统地考察李大钊与蔡和森、熊得山、吕振羽等人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所作出的重要贡献^[24]。

(二)法学视域下的李大钊研究

考察关于李大钊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法学思想与法治理念尚未获得足够关注,仍有较大待深化空间。近五年来,随着法学领域学者参与度的提高,法学视域下的李大钊研究开始向专业化、学理化、体系化方向拓展。

首先,对李大钊法学思想生成理路进行梳理,考察其学理渊源并归纳其基本论断。就生成逻辑而言,有学者指出李大钊法学思想的形成与建构得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对西方法治精华的吸收及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考察^[25]。亦有学者指出,李大钊认为树立法治观念的前提是彻底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愚民式的英雄主义人治观念”^[26]。就李大钊法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而言,有学者基于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剖析提出了“李大钊在阐明法律的上层建筑地位的同时,又富有创见性地阐明了‘法律’的自律性原理……承认法律在固化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27];另有学者对李大钊发表于1916年的《民彝与政治》(此文虽不在本综述的时间框架内,但因其观点十分重要,故而不可舍弃不谈——笔者注)中的法学观作出论证,认为李大钊正是“从民彝思想的最基本的结论出发……探讨了‘为治之道’……强调人民自由、权利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自由民权、宪政民主的主张……充分展现了其‘相当卓越的法律人的素养’”^[28]。

其次,对李大钊的宪法学、法理学以及具体部门法观念进行了专题式解读与剖析。有学者考察了李大钊关于劳工政治及权利保护的相关

论述,认为李大钊对“关于劳工立法保护如工作时间、休假、薪资、娱乐、教育等方面的设想,为后来中国相关劳动立法提供了借鉴”^[29];还有学者充分肯定了李大钊的法理学思想,认为李大钊是“探索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先驱……兼顾中西、追求民主和法治”^[30],而“法律民彝论是李大钊早期法理学思想的一个顶峰”^[30]。此外,也有学者以1913年《言治》月刊为文本基础,考察了李大钊的早期宪法思想,并就“关于‘弹劾’、国家结构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宪法与法律公布权属”^[31]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探讨。

(三)其他视域下的李大钊研究

近五年来,李大钊的文学、图书馆学、新闻学、宗教学等思想亦受到颇多关注,学界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实现了新的拓展、取得了新的成果。

一是文学研究。有学者将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对比考察,指出李大钊的文学思想相对温和,他提出的“文学‘先声’论、‘崇今’论和‘心理表现’论,三者构成其相对完整的文学批评形态”^[32]。二是图书馆学研究。有学者对李大钊开创的图书馆借阅制度、开架制度等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李大钊不仅开创了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而且充分发挥了图书馆传播先进文化的独特优势,使图书馆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的场所^[33]。还有学者以北京大学图书馆《1919—1920年西文图书登录簿》为中心,考察了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期间的藏书建设对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贡献^[34]。三是新闻学研究。有学者探讨了李大钊“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的重要思想,并对其“报史”论、“记者”论^[35]的历史价值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李大钊的新闻观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新闻学理统一起来,“既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新闻界的一些陋习,又为日益繁盛的报刊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36]，“其新闻思想和实践及其以此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成为指导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宣传报道、引导舆论的行为指南”^[37]。四是哲学研究。有

学者考察了李大钊文艺思想的哲学根基,认为李大钊进行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宏观的理论体系,而是试图以新的思想意识指导人们的生活方式^[38]。也有学者专门讨论了李大钊哲学思想中的道德问题^[39]。此外,李大钊宗教学^①思想也始终是多学科研究的着眼点,学界亦多有论述,此处不再展开。

三、李大钊研究传统热点的新拓展

近五年来,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革命实践、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李大钊的思想文本研究及其史实考订等传统研究热点仍具重要地位。诸多研究者扎根历史,聚焦专业,结合考证学、政治学等新方法,于“熟地”中进行深耕细作,产出了一批重要成果,切实推动了传统研究领域的精深化发展。

(一)关于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关系及其革命实践的研究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建党思想与革命实践向来是党史人物研究的重要课题。近五年来,学界关于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关于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的建党思路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40]。从李大钊相关研究来看的确如此。学界历来更多关注对李大钊建党实践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对其政党理论与建党思路的剖析与解读。近五年来,这一薄弱之处得到了诸多增补。有学者考察了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理论源起,认为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借鉴列宁布尔什维克政党经验,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确立了建党思想^[41]。亦有学者更加深入且系统地探讨了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具体内涵,认为李大钊从政治理性、政党与国家、

政党与人民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新政党观,并基于此建构了以“中心势力”论、“大团体”思想和“革命党”观念为核心内容的建党思路,进而领导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39]。还有学者聚焦“中心势力”论,认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早期寄希望于‘中级社会’‘中流社会’,十月革命后在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认识到‘庶民的胜利’而聚焦于劳动者的力量,中共建党到推动国民党改组时期则把推进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尤其是中共党人及其代表的无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势力’”^[42],并强调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可谓是其救国救民理念的核心表达,指导着其一切建党与革命实践活动,具有独特历史价值^[42]。另有学者同样聚焦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认为李大钊是“近代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改造中国须首先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第一人”^[43],并指出李大钊所提倡的国共合作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的深化”^[43]。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李大钊关于俄国革命的观察与思考,以此剖析李大钊建党与革命理论的思想渊源^[44]。

其二,关于李大钊与工农运动的研究。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上,是重要的筹划者、组织者、创立者”^[45]这一点毋庸置疑。正如有学者指出,李大钊首先意识到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46]。基于此种认知与共识,学者们对李大钊指导工人运动、创建革命组织的革命实践进行了细致考察。如有学者讨论了李大钊与乐亭党组织建立的关系^[47],还有学者探讨了李大钊在哈尔滨红色交通站建立史上的重要作用^[48]。同样,李大钊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如有学者认为李大钊“最早将农民问题纳入中国革命视野,深入

① 如隋金波的《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的早期探索: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述论》,载《宗教学研究》2023年第4期;加润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宗教学思想述评》,载《科学与无神论》2023年第1期;王伟、杨明艳的《论李大钊的科学无神论思想》,载《科学与无神论》2020年第4期。

分析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中国革命何以需要关注农民、近代中国农民革命何以发生和何以实现的问题”^[49]。

(二)关于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的研究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一直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近五年,相关研究于广度、深度、创新度等方面皆呈现新的态势。学界从传播渠道与阵地、传播内容及其中国化等方面切入,考察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容、特征与价值等重要问题。

其一,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与阵地考察的研究。报刊媒体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渠道,也是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重要的史料来源与文本基础。故而,有学者以《新青年》《晨报副刊》《每周评论》等为考察中心,挖掘其中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50]。除报刊以外,理论教育课程同样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等系列课程。对此有学者评价“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第一人,也是探索课程思政的第一人”^[51]。还有学者对比了世界教育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教育历史,认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不仅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是源头最早的,而且与意大利罗马大学的拉布里奥拉(1890)、俄国红色教授学院的布哈林(1921)、日本京都大学的河上肇(1924)一起,并称为世界教育史上马克思主义进入大学教学的四家最早探索”^[52]。此外亦有学者高度肯定了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53]。

其二,基于传播内容及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既不系统也不全面,因此,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展现出篇章式特征,且唯物史观是其选择性传播与介绍的核心内容。故而,学者们多围绕唯物史观对李大钊相关思想进行专题考察。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李大钊

对唯物史观的针对性辩护不仅捍卫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先进性与时代价值,也彰显了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重大学术争论的理论自觉和独特思考^[54]。也有学者聚焦《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该文是中国学界首次在唯物史观视域下阐发“阶级竞争”说、“法律”的上层建筑地位、“物心两面改造”等问题^[27]。另有学者关注并突出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逻辑性与整体性,认为李大钊更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与逻辑作系统性理解,最终“以‘青春’意象为起点,以能动的唯物史观为终点……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内容丰富而又逻辑自洽的历史阐释框架”^[55]。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文化背景与时代语境的限制,李大钊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接受与认识皆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其“把唯物史观只是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史观,具有明显的机械决定论倾向”^[56]等。关于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学者们认为李大钊本着爱国主义气节及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思考,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由此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漫长征程”^[57]。

(三)关于李大钊的史实考订研究

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58]近五年来,关于李大钊的史实考据与修订研究,尽管尚有可深究之处,但业已取得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北京大学杨琥的《李大钊年谱》立足报刊、日记、书信以及未刊档案或档案资料汇编等丰富可靠的史料,对李大钊生平事迹进行了更为细致、严密的考订研究^[59],为进一步深化李大钊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亦有多位学者扎根史料考据,从多个角度补充了李大钊研究的历史细节,对一些错误观点或空白之

处进行了疏证与填缺。其一,在文本考据方面,王宪明研究并揭示了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学术来源。他认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介绍所参考、依据的主要资料并非来自福田德三的研究,而是来自法国著名政治经济思想史家季特的相关研究,其中思想性、理论性最强的第一、四两大部分基本是从季特等人合著的《经济学说史》第四部分第三章“马克思主义”编译而来的^[60]。王磊对《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所收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正文与注释进行了校勘订补^[61],并就《俄罗斯革命的去及现在》第四部分中“列宁履历”的译文底本进行了溯源考证^[62]。其二,在生平事迹方面,学者们同样尝试通过发掘新史料或重理旧史料来调整和补充既有历史认识。如孙江考察了“五四”时期李大钊与其师吉野作造及日本黎明会的交往^[63];侯且岸探讨了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史实始末^[64];黄家猛对大革命时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中的《李大钊同志报告》进行了评述^[65];张泉泉对李大钊在《晨报副刊》的任职身份进行了考察,认为李大钊应为《晨报》第七版改革的指导,参与副刊编辑定位、栏目策划等方面的工作,并未担任副刊主编实职^[66];牟文鹏等还原了《申报》报道中的李大钊形象^[67]等。

四、李大钊研究的阶段总结与展望

李大钊研究既有历史厚重感,又有现实指向性,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研究的统一体。近五年来,李大钊研究实现了稳步发展,学界围绕李大钊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形成了系列成果,在多维视角、问题导向、文本史料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为李大钊研究这一经久不衰的研究选题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但是,总体来看近五年来李大钊研究的热度虽维持较高水平,却始终存在研究重复性强、学术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未来李大钊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一) 近五年来李大钊研究的阶段性特点

一是研究内容广泛全面,新思考与旧主题

兼具,“大问题”与“微考证”并举。近五年来,相关研究选题既包含对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等旧主题的持续探讨,又有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新主题的学理溯源。在选题大小方面,既有学者将对李大钊思想的考察放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长维度、宽场域中来观察其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关注历史实景,在学理溯源、概念爬梳、版本考辨、史实疏证等“小细节”上下功夫,从而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双路突破与发展。

二是研究选题具有极强的现实关切,李大钊研究与党的创新理论及国内热点议题呈现融合趋向。回应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功能,是李大钊研究的优良传统,也是对李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精神的生动践行。近五年来,学界关于李大钊的研究多以现实关切为指向,虽较难突破既有历史认知或学术共识,但总能以新的视角解读与阐释李大钊思想,在与党的创新理论与国内热点议题融合互动的过程中赋予李大钊研究以新的时代意义。

三是研究的新维度、新视角方兴未艾,新场域与新范式正在开拓。如前文所述,2020—2024年,诸多学者进一步尝试视角转化与多维创新,在史学、法学、新闻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特别是法学场域的专业化探讨格外引人关注,更有学者将概念史研究与话语分析引入李大钊研究。这些新维度、新视角是推动李大钊研究往深里走、往实里走的有益尝试。

当然,从学科长远发展角度看,目前李大钊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其一,李大钊研究的瓶颈有待突破。同其他党史人物研究相似,李大钊研究同样面临着缺少新材料、难开新领域、难提新观点的困境。部分研究主题同质化趋向明显,学理化研究难以突破固有范式或共识,“炒冷饭”“新瓶装旧酒”等现象较为普遍。其二,思想文本研究中“过度阐释”与“话语单一”困境并存。在关于李大钊思想的某一专题性研究中,容易出现李大钊不同思想状态、不

同历史语境下理论话语的“并存局面”,此种局面极易造成脱离历史发展具体情境、脱离文本客观具体历史环境而进行“过度阐释”的问题。而在关于李大钊文本的研究中,则多将视角局限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单一解读,对其他文本的写作动机、思想来源、现实影响等挖掘不足且文本考察话语单一。故而,未来李大钊研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尚需研究者共同努力来推进李大钊研究在新起点上取得新发展。

(二)未来李大钊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一是把握时代脉搏,面向现实关切,进一步拓展李大钊研究的新视角。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在于指导解决现实问题。立足时代发展与现实需求,历史人物研究总会衍生不同的考察热点与面向。回顾近五年来的李大钊研究,研究者总能结合党和国家热点议题,巧妙运用史料生发一些精彩的阐释与论述。此后,同样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历史素材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将李大钊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相结合,以新的观察角度或“提问方式”不断增进、丰富既有结论与范式,实现李大钊研究的整体推进。李大钊研究是一个覆盖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哲学、文学、法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为进一步开拓李大钊研究的新视角,研究者应主动在李大钊研究中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破除李大钊研究的学科壁垒,探索同一领域、同一主题下的跨学科融合。如在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版本学、解释学、概念史学研究方法,在理论考察中引入法学、政治学讨论范式,以此激活既有叙事中尚显沉寂的要素与碎片,实现李大钊研究的综合创新。与此同时,以多维视角为基础,增强对李大钊研究学术史的梳理与考察,探究其学术演进的脉络与走向,或应成为深化李大钊研究的重要抓手。此外,李大钊研究跨机构乃至跨国界的交流与合作同样具有较大潜力^[68],亟待以不同学科、不同机构、不同国家学者间交流合作为契机,面向时代问题、结合理论创新推动李大钊研究的综合性发展。

二是锚定思想坐标,面向历史全景,进一步推动李大钊研究的多向度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立体的,思想考察亦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度的。在新时代李大钊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将作为个体人物的李大钊与作为中共早期精英领袖群体人物之一的李大钊研究进行“重新构设与交叉”^[1],实现微精式考察与全景式剖析的统一,深度展现李大钊及其同时代历史人物的思想特点;另一方面需要将作为思想坐标的李大钊融入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史的“大历史”与“长链条”中,特别是要在党的思想理论框架中加强对李大钊建党思想与党建思路的探讨,重视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三是扎根历史脉络,面向细节图景,进一步推动李大钊研究的纵深化发展。历史考察是思想研究的基础。目前李大钊研究领域基础文献与史料已十分齐备,基本上不存在重大遗漏和缺失,但这也意味着要进一步在史料上下功夫或寻求新史料具有较大难度。为进一步扩展李大钊研究的历史纵深,可以尝试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其一,加大对单篇文本史料的挖掘力度,特别是对既有研究中非典型文本的考察;注意探究相关文本的原初历史语境,还原具体历史阶段李大钊的思想肖像;推动多篇史料或系列文本的互动研究与综合利用,通过“多幅思想‘截图’的重合、拼接”^[69]全方位还原李大钊真实、全面的思想图景。其二,积极挖掘海外史料,拓宽研究史料的搜集范围,充分利用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关于李大钊的文献史料,进一步充实史料库存,增强研究的立体感与丰满度。

四是打造权威学术网域,面向“五四”研究前沿,综合提升李大钊研究水平。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时至今日“五四”研究仍在学术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大钊作为“五四”时期尤为重要的一块“拼图”,历来是“五四”人物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五四”研究同样是李大钊思想、活动研究的重要前提。就此而言,李大钊研究是否能够有所突破,

不仅在于李大钊本身的研究,还在于能否突破“从李大钊看李大钊”的思维藩篱,将李大钊复归“五四”乃至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历史,在综合考察中捕捉新的研究视点。一定程度上,在“五四”研究的复杂网域中,充分汲取“五四”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联结与互动中破解李大钊研究难题,或可成为提升研究质量、提振研究信心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 [1] 宇文利. 新时代加强李大钊研究的若干思考[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2(2): 39-46.
- [2]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311.
- [3] 段炼. 血洗出一个“新纪元”: 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与“文明”[J]. 学术研究, 2021(3): 133-143.
- [4] 杨梅, 朱喆. 论李大钊文明观及其重要价值[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9): 91-93.
- [5] 魏波. 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探微: 以李大钊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97-104.
- [6] 吴汉全, 刘宏伟. 李大钊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早期探索[J]. 新视野, 2023(5): 41-47.
- [7] 刘爱章. 从李大钊的“中华文明之问”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百年求索[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7): 79-87.
- [8] 纪亚光. 从“第三新文明”到“人类文明新形态”: 思想原点与追寻逻辑[J]. 思想战线, 2023(5): 30-38.
- [9] 杨芳.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64-71.
- [10] 王宪明. 李大钊的“反孔”与“尊孔”[J]. 理论学刊, 2020(1): 151-160.
- [11] 秦冰馥. 论李大钊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109-116.
- [12] 郑师渠. 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转向自觉的鲜明标志: 论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J]. 史学史研究, 2020(4): 17-20.
- [13] 牛玲玲. 李大钊中华民族观的观念史考察[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68-76.
- [14] 牛玲玲, 燕继荣. 从“个性解放”到“大同团结”: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观的理论探索[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48-54.
- [15] 青觉, 曹高丁.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生成及意涵演化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 5-16.
- [16] 杨起予. 民本意识与马克思主义: 五四前后李大钊思想的解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107-115.
- [17] 郑大华. 李大钊“民族自决”思想的再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4): 83-90.
- [18] 吴兴德. 由中华民族新机复活到无产阶级世界联合: 李大钊的民族思想[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2): 178-184.
- [19] 皮明麻. 李大钊史学思想初探[J]. 江汉论坛, 1979(4): 62-68.
- [20] 李润苍.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史学的巨大贡献[J]. 史学史研究, 1981(4): 23-32.
- [21] 邹兆辰. 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 纪念《史学要论》出版 100 周年[J]. 河北学刊, 2024(3): 42-49.
- [22] 朱喆, 王钰涵. 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J]. 学习与实践, 2023(9): 3-10.
- [23] 于沛. 李大钊的世界历史观[J]. 世界历史, 2021(3): 1-6.
- [24] 谢辉元. 李大钊、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J]. 江海学刊, 2022(4): 200-211.
- [25] 孙全胜. 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3(1): 5-10.
- [26] 朱俊.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J]. 甘肃社会科学, 2023(1): 143-153.
- [27] 王娟娟, 吴汉全. 传播、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 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解读为中心[J]. 河北学刊, 2022

- (6):210-216.
- [28] 田坤,程波.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法学观述要[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60-63.
- [29] 闫文博.论李大钊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早期探索[J].河北法学,2023(8):59-75.
- [30] 徐爱国.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先驱探索:探寻李大钊法理学的理论体系[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6):1-11.
- [31] 赵婉华.李大钊早期宪法思想:基于1913年《言治》月刊的审视[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103-108.
- [32] 魏天无.“差异”、“调和”与“崇今”: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39-49.
- [33] 王雄青.李大钊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创及其当下价值研究[J].图书馆,2021(9):97-102.
- [34] 程援探.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对北京大学教学科研的支持:以《1919-1920年西文图书登录簿》德文图书为中心的考察[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6):92-102.
- [35] 杨欣.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早期实践[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89-97.
- [36] 杨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源起初探:基于对李大钊《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一文的分析[J].传媒观察,2023(7):112-120.
- [37] 胡蕊.李大钊新闻思想对当代青年记者的启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9):111-112.
- [38] 王春辉.李大钊文艺思想的基本要义与哲学根基[J].学习与探索,2022(11):192-199.
- [39] 王锐.道德的重要性:论李大钊思想中的一个“潜流”[J].社会科学,2023(8):56-68.
- [40] 侯且岸.李大钊的建党思考与实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3):22-27.
- [41] 彭帮姣,寇东亮.李大钊建党思想:理论源起·革命实践·当代价值[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20):79-82.
- [42] 翁有为.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J].中共党史研究,2022(3):124-136.
- [43] 郑师渠.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J].近代史研究,2022(6):53-70.
- [44] 周游.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9.
- [45] 杨河.大钊先生130年祭[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5-15.
- [46] 宋俭,魏维.论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1):4-10.
- [47] 韦磊.李大钊与乐亭党组织的建立[J].北京档案,2021(7):51-53.
- [48] 胡庆祝.李大钊对建立哈尔滨红色交通站的重要贡献探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69-77.
- [49] 尹占文,李青青.农民问题何以植入中国革命:李大钊关于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析论[J].河北学刊,2021(6):187-194.
- [50] 庆祝.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以《新青年》《晨报副刊》《每周评论》为中心的考察[J].学术交流,2021(7):5-13.
- [51] 陈琳,戴建兵.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验与现实启示[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48):66-69.
- [52] 王东.李大钊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百年传统新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24-33.
- [53] 张甲秀.从“播火”到“点种”:李大钊在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特色及重要贡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3):146-152.
- [54] 于桂凤.“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辩护及其意义[J].哲学动态,2021(4):14-21.
- [55] 李里峰.能动的唯物史观:李大钊“青春”意象与历史观念之再探[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1):33-50.
- [56] 陆卫明,曹芳.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以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例[J].理论学刊,2022(1):54-63. (下转第47页)

切优秀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这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现代文明观,能够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23-02-08(1).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7.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 [4]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等.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论文集: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30.
- [5] 列宁. 列宁全集:第43卷[M]. 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7:282.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经典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0.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59.

(责任编辑:李秀荣)

(上接第11页)

- [57] 袁清媛,王春辉. 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赜[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16-20.
- [5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 [59] 杨琥. 广搜史料多方参证推进研究:编撰《李大钊年谱》的若干体会和认识[J]. 党的文献,2020(3):104-113.
- [60] 王宪明.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学术来源探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研读[J]. 政治思想史,2021(4):1-21.
- [61] 王磊. 李大钊“五一”(May Day)运动史校勘订补[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3):102-112.
- [62] 王磊. 李大钊作“列宁履历”译文底本考[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5):103-112.
- [63] 孙江. 五四时期中日知识界的往还[J].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1):71-72.

- [64] 侯且岸. 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J]. 前线,2020(10):34-38.
- [65] 黄家猛. 大革命时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史料《李大钊同志报告》考述[J]. 党的文献,2021(1):104-110.
- [66] 张泉泉. “主编”还是“指导”? 李大钊《晨报副刊》任职身份考辨[J]. 青年记者,2022(2):119-121.
- [67] 牟文鹏,刘宝东. 《申报》视野中的李大钊[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1):87-96.
- [68] 卢珊珊,石慧. 李大钊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CSSCI数据库的计量分析[J]. 唐山学院学报,2024(4):1-9.
- [69] 张明. 文本学方法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新路向[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11.

(责任编辑:白丽娟)